

庆贺王越生教授从事教育、经济工作67周年
蔡馥生



暨南大学
中共暨南大学委员会
1993年7月

前 言

今年是暨南大学顾问、前副校长王越教授,前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蔡馥生教授诞辰 90 周年。两老数十年如一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兢兢业业,辛勤耕耘,无私奉献,为国家培养人才,桃李遍天下。他们严谨治学,潜心研究,勇于探索,学术成果丰硕。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学习两老的爱国精神和崇高品质,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对于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激励广大师生和海内外校友,同心同德,办好暨大,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和中华民族的腾飞,具有重要的意义。学校决定在 7 月 4 日举行王越教授从事教育事业 67 周年、蔡馥生教授从事教育经济工作 61 周年庆贺活动,并将记述两老事迹的部分文章汇编出版,以资留念。

暨 南 大 学
中共暨南大学委员会
1993 年 7 月

目 录

- 一、把光和热献给人民的教育事业
——记老教育家王越教授…………… 杨珍妮 陈志贤(1)
- 二、余热生辉
——介绍暨大离休老干部王越教授…………… 梁奇达(4)
- 三、一生笔墨千秋业 十度春风百岁翁
——贺王越同志九十大寿…………… 张德昌(8)
- 四、德高望重的王越老师
——庆祝王越老师从教 67 周年…………… 罗戈东(11)
- 五、王越教授主要著述…………… (12)
- 六、王越教授各时期剪影…………… (13)
- 七、理论战线的坚强战士 高等学府的辛勤园丁
——记经济学家蔡馥生教授……………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15)
- 八、崇高的品格 不倦的追求
——贺蔡老九十华诞…………… 周治平(18)
- 九、蔡老寿高人品高…………… 陈光耀(20)
- 十、满庭芳
——庆祝蔡馥生教授从事教育经济工作 61 周年…………… 罗戈东(22)
- 十一、蔡馥生教授主要著述…………… (23)
- 十二、蔡馥生教授各时期剪影…………… (24)

把光和热献给人民的教育事业

——记老教育家王越教授

杨珍妮 陈志贤

王越教授是当代老教育家，中国共产党党员，暨南大学顾问，全国教育学会第一届副会长，广东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第一届副会长，全国教育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编委，广东省政协第四、五届副主席，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王越教授从事教育工作已有 67 个春秋了。数十年来，他始终执著地追求着真理，热爱着人民的教育事业，并为之而辛勤耕耘，坚持不懈。

王越，字士略。1903 年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县的一个中农家庭，生长于劳动人民中间，自幼养成刻苦力学，热爱劳动的习惯。1920 年，他在家乡受完小学、中学教育。1921 年考进了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系读书，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影响下，王越立志启迪民智，为发展教育事业作出个人的贡献。

1926 年，王越满怀爱国之情，积极投身教育事业，先后在梅县师范学校和兴宁兴民中学任教并担任行政领导工作。4 年的教学实践，是王越接受陶行知教育思想后的一次尝试，他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在初次尝试中更加坚定了。

1930 年至 1932 年，王越先后进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深造，从事教育心理学和国学的研究。在这期间，他潜心研究，于 1931 年以王士略的笔名撰写了《人格测量》一书。此书是王越早年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代表作，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上发表过部分章节，其余未发表部分因毁于淞沪战役中，没能保存下来。在北大时，他还就中国古音韵学一些问题的研究成果，总结发表于《东方杂志》。

1933 年至 1946 年，他任中山大学广东文理学院、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副教授、教授。他目击时艰，对日寇的野蛮侵略，对国民党政府的无能与反动面目非常愤慨。同时，对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坚持抗日统一战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体会到民族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开始阅读进步书刊，接触地下党员，联系进步青年，节衣缩食，从微薄的工资里，挤出钱来，资助生活困难的进步学生，并多次利用关系，千方百计营救被国民党反动派缉捕的爱国学生。为尽到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职责，王越坚持用进步观点进行教学和研究，并于 1942 年撰写了他中年时期教育理论研究的力作《教学原理》一书，此书以王士略这一笔名，作为大学用书正式出版。

王越于 1946 年抗战胜利后回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教育系主任。为了使教育更好地为社会、为民众服务，他积极组织教育系的学生，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并在广州郊区长板村建立了一个民众教育实验区，以地下党员学生为骨干，对农民进行爱国的、进步的文化、政治教

育。

1948年,全国掀起了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怒潮,王越也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他不顾个人安危,不畏强暴,关怀爱护青年,热情支持革命,组织教授罢教。国民党反动派视他为眼中钉,对他多方迫害,在地下党的关怀下,他前往香港,参加新民主主义教授协会,从事宣传工作,继续抨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及其摧残教育的罪行。1949年王越离开香港,参加了东江游击队,加入了准备接管广州的行列。

广州解放后,身为中山大学军管联络小组副组长的王越,依靠广大进步师生员工,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为完成接管任务做了大量的工作。1952年王越任中山大学教务长,针对解放初期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的需要,他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组织师生进行与专业有关的生产劳动,并对原有的学制、专业、课程、教学方法及规章制度等,进行了大胆的调整和改革。在党的领导下,他和全校师生员工一起,群策群力,专心致志,全力以赴,把一所旧大学改造为新型的综合大学。1956年他被教育部评为二级教授,1957年王越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党和政府决定在广州重建暨南大学,王越被任命为副校长。在校长陶铸同志的直接关怀下,王越与学校其他领导一道带领全体教职员工艰苦创业,经过十年的苦心经营,把暨南大学建设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综合性华侨大学,为内地以及海外、港澳地区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

1970年,在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横行时期,暨南大学被迫停办,王越改任华南师范学院革委会副主任。在此期间,他一面为办好师范学院努力工作,一面领导翻译组的教师,翻译并出版了《关岛全史》一书(共三册)及几百万字的联合国的英文文献。

“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碎之后,党和政府于1978年决定复办暨南大学,已经70岁高龄的王越又被重新任命为暨南大学副校长。复办一所大学,千头万绪,工作量很大,他在党的领导下,和师生一起全力以赴投入复办暨大的各项工作中。经过多年的努力,如今暨南大学已发展成为拥有文、理、经、医等学院的综合性华侨大学,王越为此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83年秋开始,他因年事已高,被改聘为暨南大学顾问。退居第二线后,他依然关心着全国和广东的教育事业,经常发表文章,提出有关教育改革的意见。

作为一个老教育家,王越对教育的本质问题,有其独特的见解。多年以前,他在《教育研究》发表《关于教育是生产力的探讨》一文,指出教育本身就是潜在的社会生产力。他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阐述了解放后的教师是培养劳动大军、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工作者——生产劳动者的见解;分析了教育的巨大作用,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教育是阶级斗争实践的一部分,同时又是传递和发展生产斗争经验的实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教育的伟大作用在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并有劳动技能、身体健康的劳动者;揭示了教育是极端重要的潜在的社会生产力的本质;有力地批驳了教育只是消费项目,福利事业,而不是社会生产力的错误观点。

对学生充满爱心,是老教育家王越从教67年高尚师德的突出体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每当他看到自己心爱的进步学生突然失踪,遭到国民党反动派迫害时,就按捺不住满腔的愤怒,他说:“支持爱国青年的正义斗争是教师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要和这些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学生同甘苦、共患难。”在他的帮助下,不少进步学生脱离了危险,奔赴了革命征途并成为党的好干部。解放后他对学生同样倾注了爱。60年代初,暨大4名学生到农场参加劳动不幸落水身亡。王越得知此消息后,非常痛心,他劝告教工:我们要对广大学生的生命负责。在重建暨

大的艰苦年代,为了教育从小缺乏劳动习惯的部分侨生,王越一面给他们讲清劳动对人类进化所起的巨大作用,一面身体力行,和他们一起挖泥挑土。老校长吃苦耐劳、诚恳待人的品质深深感动了广大侨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和锻炼,这批侨生不但去掉了娇气,而且成长为爱祖国、爱劳动、守纪律的合格人才。王越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时常深入课堂,在学生中,了解情况并热情指导学生开展科研活动。有个40年代的学生翻译了一本英文书,请王越指教,王越从头到尾逐一审校,并提出中肯的意见。他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诲人不倦的精神,使学生们深受感动。几十年来,王越始终把教书育人视为天职,把教学相长的理论付诸实践。他常说:“我和学生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我们有共同的事业、理想。我们师生的感情不会因为时间的消逝,或彼此的分离而淡忘的。”

王越认为办好学校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广大教师的作用。他指出:要发挥教师的作用,首先在于教师要做到为人师表,言传身教。如果每个教师都能以身作则,坐而言,起而行,言行一致,表里一致,抵制歪风,树立正气,积极工作,无私奉献,那么我们的事业就会大有希望。要知道一个好教师,对青年人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王越还指出:老、中、青三结合,是充分发挥教师作用的有效办法。每个系都要有几个思想好、造诣高、过得硬的学术带头人,要让他们带领中、青年教师从事教学、科研活动,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才能后继有人,我们的大学才能办出水平,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

王越从教数十年来,一直担任各种行政领导职务,工作虽然繁忙,但他始终没有脱离科研工作。他认为:一个担任学校领导的学者应该挤出时间,联系实际,从事理论研究,要探讨教育理论,研究教学规律,搞些科学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带领师生办好大学。王越说到做到,据统计:解放前,他撰写了《人格测量》、《教学原理》两本书,发表过10多篇有关心理和教育方面的论文;解放后,他又与友人合作,编写并出版了《中国古代教育史》和《中国近代教育史》,发表了《论私人讲学之风不始自孔子》、《墨翟新考》、《南宋反道学的斗争》、《朱舜水评传》、《孔墨教育思想的特点和比较》等30多篇论文,并与友人合作,用英文编撰了《国际学术教育论文选》。暨大复办后,王越领导有关研究人员,编写《当代中国华侨教育》一书,他离休后,仍继续关心该书编写工作。1990年4月,该书获全国首届教学科学优秀成果奖,受到海外教育界的欢迎和赞许。王越擅长诗词,吟咏不辍,出版有《南楼诗词抄》。

王越如今已90岁了,但他至今壮心不已,他说:“我要抓紧时间多留点东西给后人。”老教育家王越教授,就是这样一位为人民的教育事业辛勤耕耘,无私奉献的人。

余热生辉

——介绍暨大离休老干部王越教授

梁奇达

王越同志是位老学者，老教育家，从事教育工作六十余年，是第一届全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他又是一位社会政治活动家，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积极从事抗日民主活动，一九四九年春夏间在香港参加新民主主义教授协会，不久复进入大鵬湾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五二年加入民主同盟，一九五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民盟中央委员，广东省民盟副主委，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暨南大学副校长。一九八四年因年迈退居二线，担任暨大顾问，咨询委员会主任，一九八八年离职休养。王越同志离休后，仍然十分关心党的教育事业和暨大的发展。

要造就德才兼备的人才

王越同志退居二线，除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外，并任暨大顾问和学校咨询委员会主任，他极其重视教育工作，他的教育思想尤其强调要造就德才兼备的人才。一九八六年与一九八七年之间，北京部分大学生写大字报，上街游行，出现不正常的学潮。王越同志凭他共产党员老教育家的政治敏感，就觉察到这次学潮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深为一部分青年学生政治幼稚、无辨别是非能力而忧虑。一九八七年春他得到广东省政协和省委的支持，组织十位政协委员，由他任组长，深入高校考察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学校党政领导对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情况。为期十多天，陆续到中大、华工、华师和暨大，分别同学生、教师、干部和学校领导座谈，共同分析情况，商议加强学生的思想教育问题。王越分析当前思想动态后指出，“一个学校明确培养什么人很重要，一定要培养德才兼备、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过去政治思想工作存在不少问题，对学生人生观世界观教育不够”。最后他提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几点建议：当前学生思想很不稳定，不能掉以轻心，除了加强日常的思想工作外，要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提高学生辨别是非能力，澄清当前一些糊涂观点；切实把思想工作与教学密切结合起来，做到教书又育人；开辟第二课堂，让学生到社会实践中增长知识提高觉悟；加强学生的民主管理，从宿舍到教学都让其参与。最后他着重指出，一所高校，学风校风问题很重要，但首先是党风要搞好；政工队伍素质要提高，政工人员生活要改善，一家四口住十二平方米怎样工作？职称评定政策要贯彻调整，等等。学校领导对他们的意见非常重视，对十位高龄政协委员不辞辛劳深入学校视察非常感动。不久他们视察高校的报告就在全中国政协报上发表了，引起了教育界的关注。

一九八七年三月在他主持的一次学校咨询委员会上，他发言强调，“要把对学生进行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作为重要任务,这对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至关重要。”在政治工作方法上他提出“政治工作要细水长流,政治课要讲《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他说:“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证明,只有共产党领导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一九九〇年五月的一次咨询会议上,谈到北京发生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时,他非常痛心,强调学校稳定是重点,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建议学校邀请海外爱国学者和校友回校作报告,现身说法,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使他们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又说,还可以利用反面教材教育学生,如驳斥严家其等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及刘晓波“中国要沦为殖民地三百年才有发展希望”、“中国黄种人要改造”的谬论。在一次广东社会科学联合会的年会上,王越仍再三强调肃清上述谬论的必要性。可见其立场何等坚定,旗帜何等鲜明!

一九九〇年王越同志在《德育探索》第一期上发表题为《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社会主义觉悟》一文,论述了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和德育教育的内容与方法。

王越同志退居二线后,除了反复强调提高教学质量,搞好科研加强外语教学是“关系暨大的声誉”之外,对德育教育还倾注了不少心血。

著书立说 笔耕不止

王越同志在建国前,撰写过一些专著,如《人格测量》、《教学原理》等,解放后又撰写过不少论文及专著,退居二线后仍伏案笔耕不止。《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国古代教育史》是七十年代后期根据教育部的安排,由王越、杨荣春、周德昌教授任主编,作为教科书来编写。一九七九年完成初稿,由于当时受左的思想干扰,一九八二、一九八四年分别重新修订。《中国近代教育史》于一九八六年出版。《中国古代教育史》于一九八八年出版,其中删改整理费时四年,从初稿四十万字改为现本二十万字,其工作十分艰巨。原第一、二章是由王越亲自撰写,修改也由他动笔。一九八二年教育部计划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教育》分册,王越任编委。该书一些难写的条目,他主动承担任务,如墨子、朱之瑜、颜元等。光墨子一条就写了八千字,相当于一篇论文。特别是朱之瑜,朱晚年去了日本,搜集他的材料较为困难,最后还是由王越主动承担而完成。

《中国古代教育史》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分册,出现一些引文有出入,都是由王越同志一一点出才得到改正,有些编辑人员对史料查无出处,也是由王越同志点出才迎刃而解。

《中国古代教育史》出版后,他仍笔耕不息,接着动笔著述《论人性》,他甚为尊崇墨子的学说及其为人,而且有其独特的研究心得。他曾在《国际学术教育论文选》(英文版)发表论述孔子和墨子的文章,特别是关于对墨子的论述引起了一些外国学者的很大兴趣。不少外国学者还来信表示对中国古代有这样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感到惊奇和敬仰。因而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他治学严谨,有的观点与助手不一致时,就进行认真的讨论,甚至达到激烈辩论的程度,但他从不以老压少,强加于人,而是充分摆论据,以理服人,达到统一认识的目的。

与此同时,他又指导张泉林同志等编写《当代中国华侨教育》一书,初任组长,后改任顾问,参与编写计划,亲笔写“序言”,又对全书二十三万字逐章审阅。该书获全国首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此外,为纪念陶行知一百周年,由何国华副教授撰写的《陶行知思想》一书的序言,也是王越同志写的。

他勤奋读书、著书的精神令人十分感动。在今年初夏因患疝气病而入院治疗以前，每天除早晚散步两次外，都在书房伏案工作十几小时，常至深夜十二点、一点。数年前余瑞璜教授住在他前面，夜半起来上卫生间，仍看到他书房灯光明亮，曾善言劝他保重，他只以一笑表示谢意。王越同志不顾高龄长期表现这样的毅力，这是很难得的。

王越同志对孩子要求很严，也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要求孩子要珍惜时间，全神投入自己的学科领域，不要分散精力，浪费时间。在他夫妇俩的严格教育下，五个孩子个个成才，品学兼优，有教授、副教授、副研究员、讲师，有的还在天文科学领域中有所贡献。

党的忠诚儿子

在人们的心目中，王越同志是德高望重的长者，同时他也是党的忠诚儿子。他身体力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他和知识分子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校内校外来往无间，和他们探讨学术问题，关心国家大事，了解他们的心声，反映他们的意见。每逢春节，他总要逐一上门拜年，包括华师大原来他的学生。得知某教授有病，他就不顾自己年迈体弱，拄着拐杖上门探望，或赴医院慰问，对其他干部也如此。诸如朱杰勤、黄铁球、陈乐素、叶增亮以及常绍温、杨嘉等教授患病时，他都把党的温暖带给他们，使受探望的同志深受感动。对专家的逝世，王越同志都是非常悲戚的，既痛感失去学海知交，又悲叹学术界的损失。深沉的哀思从他撰写的挽联里表现出来。如他敬送宋史专家陈乐素教授的挽联写道：“宣扬求是精神、两卷鸿文堪问世，树立过庭风范、一门史学有传人”。敬送史学家朱杰勤教授的挽联写道：“学海失知交、病榻音容成隔世，门墙森博士、毕生衣钵有传人”。如平日对专家没深入了解，就不可能表达出对他们学术及为人的评价。此外对尚仲衣、郭安仁、黄海章、何家槐、杜桐、黄铁球、胡一声等逝世，均写诗哀悼。

他对后辈的扶掖更是不遗余力，从编著立论，撰写大纲，审稿以至作序，都亲躬其事，正如周德昌教授说：王老对晚辈是非常厚爱的，从学术到生活均无微不至，爱心拳拳。

他还特别关心知识分子的政治进步，如对我校翁显良教授以及副教授方惠平的入党要求十分关心，尤其是对翁显良同志还亲自做了许多培养教育工作。詹伯慧教授参加民盟还是他和杨嘉同志介绍的。现在詹教授已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民盟广东副主委，全国人大代表。他看到这些晚一辈的中青年教师的进步和成长，心里感到十分欣慰和高兴。

对学者专家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他常牵挂在心，他认为某个时期关于大学教师升级的条例以及教授的工资标准下降的情况，不利于调动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曾与数名教授联名上书中央，并在不同场合向省领导和有关部门反复陈述自己的意见，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王越同志组织观念很强，组织安排他的工作，如政协、民盟的工作，各种外事活动等他都积极参与，省委每次组织老干部听传达文件，他从不以写作忙而请假。

“不要忘记交党费”，王越同志这句话给老干部支部的同志留下深刻的印象。每次领完工资，他就亲自立立即交党费。一次因病不能亲自领工资，就郑重地交代儿媳说：“千万不要忘记代我交党费”。党的组织观念在他心中占的份量何止千钧！他对党只知全心奉献，却从不向党伸手，这更是流传于党内外的美谈。他夫妇俩独居多年，从不要求调回一个儿子在身边。他的小儿子思华，还是我校物理系所急需的专业人才，一九八四年才把他调来我校。

王越同志对党的忠诚是一贯的，远在三十年代末，他在中大执教，爱国学生的救亡运动遭到镇压，学生被戕害，他就不畏强暴，不顾个人安危，采取各种办法掩护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骨干，甚至把他们藏在家里。当有人被捕，他就挺身而出到国民党警察局评理辩论。就这样他营救了多名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锺谿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后来抗战期间锺任八路军驻汕头代表。

王越同志强烈的党性观念萌芽于三十年代末，从入党时到退居二线后，仍一如既往，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有人说与王越同龄人王起、王力均已出版了各自的《文选》，唯独王越同志无此计划，却另选新题作为著作目标。他已步入耄耋之年，健康已不如前，但为社会主义辛勤工作，笔耕不息，图的是什么呢？正如他回答人们时说：“我要抓紧时间，多留点东西给后人”。他不为名不为利的美德已为人们所共知。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一员，为中华文化大厦多添一砖一瓦，这是他的最大心愿。王越同志的高尚品德，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一生笔墨千秋业 十度春风百岁翁

——贺王越同志九十大寿

张德昌

(一)

正如人不会忘记历史一样，暨南人永远不会忘记在 58 年重建暨大、78 年复办暨大的那些“元勋”。

暨南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国立大学，1949 年 9 月停办，合并于复旦大学、交通大学。1958 年经国务院批准在广州重建暨大，当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亲自挂帅，王越、梁奇达和朱明在学校主持工作。

58 年正是“大跃进”年代，尽管人们头脑有些发热，做了些傻事蠢事，但那种敢想敢干的气概和勇往直前的精神却是最为宝贵的。暨大经过短时筹备，白手起家，就在石牌岗顶的山头坡地、在华侨补校校址办起了一所 5 个系 11 个专业的大学，并于当年 9 月开学了。她不是海市蜃楼的幻影，也不是普希金笔下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而是千多师生活动期间的真实存在，可称得上一个奇迹。

当然，这里有中央的支持，有华侨、港澳人士的赞助，有陶铸的领导，但是在学校现场总其成者是王越、梁奇达。他俩一政一党、一文一武、一宽一严、一缓一急，是在知识结构、领导艺术、工作作风等方面可以互补的理想搭档。他俩除了主持学校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外，还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关系请教师、调图书、搞基建。58 年学校首届新生开学之后，根据陶铸的提议，成立了暨南大学建校委员会，以广州市长朱光为主任，王越等为副主任。建校委员会全面规划和领导学校的基本建设，很快一座全省最大的教学大楼在王宽诚赞助下拔地而起，连同成片的教工宿舍、新颖别致的学生食堂等，至 60 年共完成建筑面积 23000 多平米，基本满足当时需要，为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如果说 58 年重建暨大时王越还年富力强，那么到 78 年复办暨大时王越已逾古稀之年了。

1970 年受到“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的暨大被迫撤销，校园被第一军医大学接管，教工被“四马分尸”，仪器图书被几所高校瓜分，一所全国重点大学从此在中国大学名册上勾掉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经过拨乱反正，1978 年 1 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暨南大学。1978 年 3 月广东省委决定成立复办暨大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由杨康华任组长、梁奇达任副组长、王越、罗戈东、朱明、李天庆和刘希正为成员。就这样王越又从华南师范学院回来复办暨南大学了。

复办暨大像一场野火春风激起原暨大教工无比的热情，得到社会人士、特别是华侨港澳人士的广泛赞扬。但是复办暨大谈何容易，校园被占无落脚之地，教工归来无藏身之所，清理废墟

比重起炉灶还要困难。何况国务院要求当年复办当年招生,不仅恢复原有的专业,还要新办医学院,所遇到的难题数不胜数。那时从上到下从早到晚忙得团团转。在梁奇达的临时住地即使是星期天也有数十人排队等候谈话。王越更是老当益壮、呕心沥血。他住在师院每天拄把雨伞上班,晴天一身汗,雨天半身湿。当时一个棘手问题是一些骨干教师不愿回来,这里边原因很复杂,有的是“文革”中受到冲击怨气未消,有的是人际关系紧张矛盾未解,有的是单位挽留情面难却。而这些教师大都具有真才实学、造诣颇深,是办好暨大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王越便亲自登门拜访,路远者便亲自写信致意,敦请他们回校工作。他们基本上都回来了。有的说:“被王越老礼贤下士精神感动得浑身冒汗,不回来对不起他老人家。”有一天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吴宏聪告诉我:王越老曾经到他家,天气很热,满头大汗,坐下半天讲不出话来。后来弄清楚,是中大大中文系有两位原暨大教师不肯回来,求他不要留难,并帮助动员劝导。吴先生说:“这种精神太伟大了,现在我总算明白为什么刘备三顾茅庐感动得诸葛亮为西蜀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二)

王越是受人尊敬的学者、著名的教育家。广州解放时他是军管会派驻中山大学联络组副组长,后来又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教务长,陶铸请他来办暨大,是经过认真遴选的。

暨大重建于大跃进年代,正在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开展声势浩大的“教育革命”的时候,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时代烙印。劳动安排过多过重,师生参加炼钢筑路、下厂下乡,专业课打破固有规律,搞什么“单科独进”、“二龙出海”。但是当时的学校领导还是比较清醒的。59年2月学校召开全体教工大会,王越作报告,梁奇达作总结,一致强调“必须切实加强对教学工作的领导,整个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举凡政治思想教育、科学研究、生产劳动、基本建设都应为教学服务”。60年9月,我刚调来暨大工作,第一次参加教工大会,就听到王越大讲“稳定教学秩序,培育浓郁学风”。这些话今天听来普普通通,理应如此,但是在政治气氛空前高涨的年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只有真正的教育家才具有这样的胆识。

一所新校能否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关键在教师。而教师除了借助外援外,更重要的是自己培养。暨大重建初期,教师只有105人,有些课程开不出,要请兄弟院校支援。为了迅速建设一支师资队伍,王越抓紧教师培训工作。他要求校内有导师的实行以老带新,订立师徒合同,包教保学;校内导师力量不足的请外校代培,派教师出去进修,系里定期检查。王越利用他的老关系,亲自登门请名师,使我校送出去的教师几乎都有著名专家指导。这是一项带有战略性的措施,保证了暨大这所新校很快就有一支过得硬的师资队伍,为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当时人手少,一个萝卜几个坑,但学校对教师开课要求很严,从不马虎迁就。新教师新开课、老教师开新课都必须写出讲稿,先在教研室征求意见或进行试讲,然后由教研室集体听课,组织评课。王越经常深入课堂听课,深入教研室参加课评。他对教师讲课既有鼓励也有鞭策,既不捧杀也不棒杀。开始时教师见他来听课情绪紧张,举措失常,后来被他一丝不苟、关心爱护精神所感染,不仅不怕反而主动邀请他来,希望得到他的指点。而他从听课、课评中增加了

对教师业务水平的了解,有利于对教学工作的领导。

(三)

王越对人彬彬有礼,具有长者风范。凡认识王越的人谁也没有见他动怒发火,甚至大声训人。大学是个小社会,事情千头万绪,不可能事事尽如人意。对不同意见,他总是态度诚恳,耐心说服;对出现的过失,他总是循循善诱,透彻剖析。所以学校里不论教师工人,不论官大官小,无人怕他,无人不尊敬他。“文革”中他被关被斗,遭到严重摧残,家中几次被抄被查,损失巨大。但他看得很开,胸怀大度,从不与人谈及有关的人和事。我知道他家中有幅古画被人拿走,落实政策时我负责此事,几次请他提供线索以便追回,他也是一笑了之。

王越很讲“礼”。这个礼当然不是孔夫子“克己复礼”的礼,而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待人接物的行为规范。如春节时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互相拜年。凡是给王越拜年的人,他都要记下姓名、问清住址,然后逐家逐户地回拜。有人出版专著送他请教,他总是认真阅读,写回信表示感谢,遇有不同见解,也能提出来与作者交流。平时与王越谈话,谈论的题目除了办学治校之道就是著书立说之事,从不涉及无聊的事,更不涉及是是非非的事。有人说:与王越交谈,感到人格净化。

王越不苟言笑,或以为是个缺乏感情的人。其实王越的心是滚烫的,如果你通过王越诗词看王越,你就会多层次多角度地看清楚他是位感情非常丰富的人。我有幸拜读过他的《南楼诗词钞》一书,书中收他 290 首诗和 26 阙词。他的词多是慢词,如按詹安泰先生分类标准,可属于“高旷清远”一类。他的诗多是七绝,颇有善于选择典型事件加以形象刻划的杜牧风格。他的诗词总的说来意境清新,格调高远,形象鲜明,语言精粹,读起来令人觉得有股奋起向上的力量在鼓动。我特别喜爱他那些异国采风篇,有庄有谐,飘逸潇洒,有对国外先进科技和秀丽风光的赞叹,也有对其腐朽生活方式的嘲讽。在他的笔下,外国的月亮有圆有缺,他的态度不卑不亢,展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傲然屹立、自尊自爱的形象。

我从 1960 年开始在王越领导下工作,得到他耳提面命,鞭策我不敢落后,受益匪浅,但毕竟是一上一下隔着一层,不能说有很深的了解。后来我到学校工作,王越已退居二线,无缘直接在他身边耳濡目染,深感向他学习不够。今年庆祝他老人家九十寿诞,仅以此短文叙述几个片段表示我的敬意。“但愿人长久”,愿王老长寿百岁,过十年再为他举行百年大庆。

德高望重的王越老师

——庆祝王越老师从教 67 周年

罗戈东

王越教授从教 67 周年，桃李满天下。

我于 1963 年秋到暨大工作，与王老师共事数十年。虽然我的工作岗位在校党委和校部，但我一直把他当作我的老师，他的言行身教都是我的楷模。

立言立德，王越老师皆称典范。尤其令我敬佩的是他的德行，他的道德品质，他的高尚情操。

十年浩劫，王老师被整得死去活来，但没有动摇他对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1978 年 9 月复办暨大，他已古稀之年，但他一如既往数十年如一日，与当时负责复校的几位老同志夜以继日地全力以赴地工作，完成了当年复办当年招生的艰巨任务。

他助人为乐，时刻不忘广大群众。每次赈济灾区、灾民，他都慷慨解囊，是我校教职工中捐赠数量最多的一个。

他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课堂，了解外语教学情况。经常与教师、学生亲切交谈，“老三届”的暨大毕业生常常挂念他老人家的生活、工作和健康。

他谦虚好学，学到老，做到老。64 年暑期学校举办整风学习，他从来不缺席。总是那么谦虚地努力学习，并说：“受用不尽”。

王越为人师表，具有崇高品德和高尚情操。他克己奉公、生活俭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没向学校提出过个人要求。他默默耕耘，无私奉献。他平易近人，与他相处如沐春风。他具有我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特点：正派、公道、耿直、忠诚于自己从事的事业。

我常常慨叹党风不正，为害甚烈。有些人高官厚禄，或者腰缠万贯，虽然挂着显赫一时的衔头，但他们藉开放改革之名，抛弃了我们党几十年来培养起来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他们脱离实际，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他们孜孜以求的是名是利是权。口头讲的是“向前看”，做的是“一切向钱看”。

正因如此，我十分高兴有机会参加王越老师从事教育 67 周年庆祝活动，我着重讲他的优良品德和高尚情操，让我们以他的言行作为学习榜样。我相信，学习他的榜样，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将会继续发扬。有火种在，火是不会熄灭的。因致祝词曰：祝王老，风采照晚霞，奉献赤心育教业，呕心沥血暖千家，英名传中华。

王越教授主要著述

专著

- 一、人格测量(笔名王士略),一九三一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社出版。
- 二、教学原理(笔名王士略),一九四二年香港文化供应社出版。
- 三、中国古代教育史(与人合著),一九八八年吉林教育出版社印行。
- 四、中国近代教育史(与人合著),一九八六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印行。
- 五、国际学术交流教育论文选(英文版、与人合著),一九八三年华南师范大学、广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印行。

论文

- 一、论先秦私人讲学之风不始自孔子
- 二、走出孔门独树一帜的墨翟
- 三、墨翟教育思想
- 四、评韩愈《师说》
- 五、对北宋程颐的剖析
- 六、南宋反道学的斗争
- 七、程朱拒墨而颜元宥墨
- 八、蜚声海外的明末教育家朱之瑜
- 九、关于教育是生产力的探讨
- 十、批判杜威的人性论
- 十一、“有生于无”新解

以上论文发表于中山大学学报、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宋元文史研究、教育研究、教育论丛、暨南大学学报等刊物。

王越教授各时期剪影



◁ 1949年春，职掌中山大学教育系主任，与友人发起组织中山大学全体教授，举行罢教运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摧残教育。

夫人李超心从事民众教育工作。

▷ 1949年秋广州解放，军管会委派小组接管中山大学。图为1989年小组同志聚会于康乐园，留影纪念（左三为王越教授）。



◁ 1981年暨南大学代表团杨康华、王越、李天庆、马殊等四人，访问加拿大温哥华市，与当地侨领及加国人士欢聚一堂（前排左二为王越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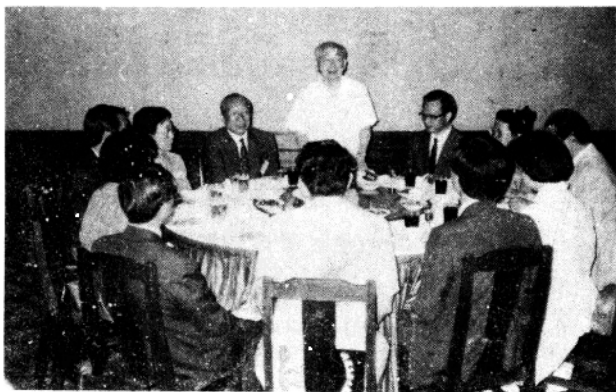
▷ 1982年与李天庆、翁显良先生，代表暨大访问香港大学校长黄丽松教授（右二为王越教授）。





◁ 1983年与杨康华、曾源、林锋等陪同王震同志视察学校（左一为王越教授）。

▷ 1986年代表广东省政协接待港九代表团（立者为王越教授）。



◁ 1989年与梁奇达、杨毅、李超心等同志合影（左一为王越教授）。

▷ 与毕业学生代表团合影（二排左三为王越教授）。



（封面左图：王越教授近照）